

名家共享书房

《被偷走的生命》是虚构的传记还是伪装成传记的虚构？

加尔桑：当一切被写下时 改编就已经开始

■本报记者 柳青

克里斯蒂安·加尔桑比他的作品先来到中国。

1990年，当时还是中学老师的加尔桑第一次游历北京，那次中国行促使他决心开始以写作为职业。之后，他以记者、旅行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等不同身份多次游历中国，以至于长居在法国南方马赛的他和他出版社开玩笑：“北京和上海是除了巴黎之外，我到访次数最多的大城市。”他在1993年出版处女作《生命如歌》，到2010年时已被法国文学评论界公认为风格鲜明且不容忽视的法语当代作家。而他的作品中译本比他本人的行迹迟了30年，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首发的《被偷走的生命》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加尔桑著作，这是加尔桑的早期作品，写于《生命如歌》之后。在上海八月酷热的黄昏，加尔桑面对着“熟悉得堪比塞纳河畔”的苏州河湾，缓缓说出：“我从1990年代一次次来到中国，逐渐了解这里，现在，中国的读者从我的1990年代的作品开始了解我，这是奇异的缘分。”

加尔桑热爱中国绘画，吴道子是他最欣赏的画家之一，在他心中和凡·戴克、卡拉瓦乔地位相当，在2000年前后，他出版了一本以中国绘画为灵感的散文集《茉莉花和雌雄混杂的味道》。2005年出版的小说《机缘巧合》部分挪用了他本人的经验，小说的男主角是记者，结束漫长的中国之行回到欧洲，他的生活被撕开了一个奇幻的平行世界。在更早的这本《被偷走的生命》里，“莎士比亚”章节的题记引用了李商隐在《义山杂纂》里的一句“屠家念经”，以此概括莎士比亚说纷纭的人生传说。甚至，在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组织的“仲夏文学漫步”采风活动中，来到“两万户”工人新村改造的“长白228”街坊，比起欧美同行们诧异的探究，他很淡定地说：“关于工人新村的故事，我是了解的，起初是从中国

电影里，后来我来上海时，也去过实地。”

但加尔桑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通”，“且不说我来了这么多次还没把中文学好，事实上，每一次我在中国时，都会感到强烈的落差——我通过历史、文学、艺术和当代报道所了解的中国，总是无法覆盖我亲身在这里的感知和体验。”他回忆了7年前在中国的长途旅行，当时他受邀写一部关于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尼尔的传记，尼尔在1920年代初几次进藏，并且在1924年成为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西方女性。加尔桑重走了尼尔的坎坷行程，取道甘肃，进入青海，以塔尔寺为起点，经玉树和安多，绕道川西，从云南进入西藏，由昌都抵拉萨。因为夏季山洪，他无法继续像尼尔那样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山口前往山南，于是向西探访荒凉的高原，最后，面对着平静如镜的纳木错。他说，他对尼尔的生命和中国的地缘文化都有了全新的认知，又一次感受到文本和现实的剧烈落差。这一点恰恰是激发着他写作的原动力：“书写总是追赶着真实。即便历史档案保留了一部分事实的细节，但是生命的真相存在于这些信息之外巨大的空白中。我们通常定义的非虚构文学和更广义的文字记录里，真实的概念存在吗？我表示怀疑。写作开始的时候，改编就开始了，当作家试图把消逝的过去定格在纸面上，把鲜活的生命经验转化成文字，虚构就开始了。”

加尔桑认为，虚构和非虚构是人为定义的界限，他的写作在起始阶段就打破了这条界限。《生命如歌》和《被偷走的生命》在形式上是一部不同人物的“微型传记”合集，传主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角色，更有和作家私人生活产生交集的“无名者”。在书写真实存在的人物时，他们的生卒年月是客观的，但加尔桑用超现实的笔法想象着他们人生中独一无二的时刻。这些文本糅合了散文、传记和小说的文本，也使得虚构和写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既是想象的传

记，又是伪装成传记的奇谈。

事实上，加尔桑借鉴了古代拉丁文学中的“名人传”和中世纪游吟诗人常用的文体，不追求线性叙事和完整事件，无意于制造信息连贯的故事，围绕着特定的人物、细节、片段和假设获得了凌驾于“真实”的特权，作者寻觅着奇特且与众不同的碎片，从中发现个体独一无二的辨识度，找到生命内在的独特性。杰出而无名的生命，统统从现代调查所要求的“证据”中被释放出来。在加尔桑的笔下，神话人物卡桑德拉、被遗忘的中世纪诗人、身世成谜的剧作家和他的寂寂无闻的外祖父，这些生命是平行的，还有他在研究家谱时翻阅的那些仅仅留下了出生和死亡日期的生命，所有这些名字留下的空虚和空白里，本该是生命丰富可能性的汇聚。他给作品起名《被偷走的生命》，意思是从遗忘中偷取生命，也就是用虚构的方式复活被遗忘的躯体，在档案和想象、证词和传说、已知和遗漏之间，重新发现生命的内在风貌。

加尔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打开陌生的世界、隐秘的世界乃至看不见的世界，例如寓言创造了高密乡，普鲁斯特创造了贡布雷小镇，这些作家用充满个性的描述方式，把读者带入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和自己过往一无所知的生命产生共情，这种在阅读中产生的通感体验，与你我此时此刻进行时的生活，才是唯一的真相、唯一的真实。

法国评论家里夏尔·布兰对《被偷走的生命》和加尔桑的风格有过这样一段独到的评述：他用写作创造了一切真实，又没有什么真实”的生命，这个由遥远年代的气息、痛苦和欢乐、残酷和疯狂组成的源远流长的世界，宛如小径分岔的密室，迷宫深处栖居着扰人身心的远古力量。他是一个感性的组织者，用生者的言语和遗失的声音交织出一场回声的游戏，东方与西方、渺小与伟大、正史与传奇、私密与集体的多声部奏出生命的交响，给当代文学带来一种奇特的美学。

书市新态度



被爱书人称为“彩虹墙”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我们把近年来最重头的的一个首发式放在了上海书展。”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口中的书籍便是被爱书人称为“彩虹墙”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昨天，该套丛书在上海书展迎来第1000种首发的里程碑时刻。这项堪称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上新”，吸引了现场大量读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不怕规模大、不怕时间长、不怕难度高，是商务印书馆对于这套40多年来累计出版22辑1000种“丛书”首发的里程碑时刻。这项堪称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上新”，吸引了现场大量读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从1981年开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出版，在40多年的岁月里不曾停歇，陪伴着、影响着几代中国学人与广大读者。昨天的首发式也吸引了全国法学界、哲学界、历史学界的多位“大咖”前来聚首。

“1000种丛书，为中国的学术、学科发展和中国的思想启蒙、思想结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法学教授何勤华用“无可估量”来形容“丛书”对于中国法学的意义。如《拿破仑法典》《法学总论》代表了一批世界法律制度的集大成者；《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等将近代西方法律进步的理念引入中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洛克的《政治论》等书则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法制文明最高成果的思想精华。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哲学教授孙周兴是

几代中国学人与广大读者 四十余年未曾停歇的学术翻译工程，陪伴影响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第一千种在上海书展首发

为“丛书”翻译作品最多的译者之一，达到13种，他也是哲学领域里最高产的译者。在大学就读时，孙周兴就开始阅读“丛书”，对“丛书”的发展如数家珍，“我大学时丛书有100多种，2006年300多种，如今转眼来到了1000种。”他告诉记者自己无比期待着2000种的到来，“把2000种放在书房，可以说涵盖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

世界性、集成性、大众性，在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陈恒看来，当代的国际文库普遍具有这些特点。这些标志之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已在读者间打响“深耕学术”的品牌效应。陈恒做过统计，全球范围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学术领域的丛书中，规模排名第一。他用“长期主义精神”形容“丛书”的出版，一代一代商务人不为市场而动摇，不论选书、出书的过程多么复杂，他们永远坚持质量第一。

当下，人工智能已被应用于翻译工作中。在可以把原文一键翻译成中文的情况下，我们为何还需要阅读汉译名著？“阅读翻译作品，读者是在汉语语境中进行理解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认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知识内化的过程。据顾青介绍，1000种书籍背后是600多位译者和上千乃至上万人的学术团队。在他眼中，“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名著”二字并不仅仅指代原著本身，还包括了译本。在商务印书馆“蓄水池”的模式下，一个译本要在学术界经过多年的打磨并得到学界的认可后，才有资格进入“丛书”之列，“丛书代表了学界翻译的最高水平。”顾青表示。

“让唐诗回到唐朝”

陈尚君40余年心血之作，超1800万字《唐五代诗全编》首发

■本报记者 李婷

一个人，40余年学术长跑，超1800万字超大型唐诗总集文献——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唐诗文献研究专家陈尚君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昨天在上海书展首发。全书首次公开亮相，共50册1225卷，惊人的体量和浓厚的学术气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

“人生短暂，能做成一两件有价值的事便是很大的幸运。我一直在等这一天。”首发式现场，陈尚君引用罗隐的诗句自况：“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认为，个人置于时代之中，十分渺小，但如果个人能够跟着时代的节拍，努力前行，得到时代的承认，也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之一。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个人完成的篇幅最大的一部书，“虽说是文献整理，其实基本上是内容。而一个人完成如此大的著作，不假手于人，所有关于编纂、研究唐诗文献的甘苦、喜怒哀乐，都由一个人来体会、玩味，也是人生一次特殊的体验。”陈尚君向记者坦言，作为40余年唐诗研究总结性著作，《唐五代诗全编》是对他个人能力的极限挑战，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365天几乎全年无休，如此心血的付出，为了结自己的一个心愿——“让唐诗回到唐朝”。

光华楼27楼那盏灯总是亮到深夜

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陈尚君在将唐诗的基本文献和清编《全唐诗》做对比时，发现了前人在汇集、整理唐诗时，考订粗率，且还有大量的文献没有用到，以至《全唐诗》失收、误收、作者小传缺误、诗歌录文讹误等问题比比皆是，这让他认识到全面而细致地重新整理唐诗，向人们提供一部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唐诗集成性文献的重要性。



《唐五代诗全编》共50册1225卷。陈尚君。(均上海古籍出版社供图)

制图：冯晓瑜

以学术长跑构建超大型唐诗文本资料库

“《唐五代诗全编》的出版，实现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将极大丰富今人对唐诗产生、传播生态的认识，也为人们深入探索唐文明精华提供丰厚可靠的信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说。

“清编《全唐诗》成书以后的几百年中，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在对《全唐诗》进行补充和修订，也一直盼望着有一部全新的唐诗总集出现。陈尚君四十年孜孜以求，穷尽了宋代以来集唐诗的各种文献，通过个人的学术长跑构建了一个超大型唐诗文本资料库，完成了几代学人的心愿。”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看来，《唐五代诗全编》努力“回到唐人立场”，刻意“求全、求真、求是”，集唐辑考之大成，为当代古籍整理树立了新标杆，提供了新典范。而复旦大学给予学者宽容而自由的学术环境，上海古籍出版社坚持十余年打造精品，这亦体现了上海文化的有容乃大、包容理解，守护传统、礼敬人才的优秀品格。”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竭尽所能做到最好。”陈尚君说，书面世以后，最重要的是接受专业人士与读者的审阅，不断听取意见。“我已经73岁了，希望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对这部书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修订。”

AI是中国出版业发展新机遇

“书香上海·东方阅读盛典”探讨跨界话题

■本报记者 许晴

阅读是传承文化薪火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智慧力量的重要方式。202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期间，“书香上海·东方阅读盛典”举办，“新华荐书·东方书单”和“年度十大东方读书人”评选同步启动。

“出版被称为永远的朝阳产业，就在于能与时俱进，积极采用新技术提高出版水平。中外出版历史证明，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极大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活动现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郑书林认为，AI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新机遇，直言AI不会使出版业死亡，而出版业不用AI就“死定了”。

出版业的历史，就是出版随人类社会的科技文化进步而不断采用新技术，提升出版服务水平的历史。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出版业全面提升水平并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出版人应与时俱进用好用信息技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他也提醒：人工智能虽是强大工具，但取代不了作家、科学家、出版人，而是可以帮助作家、科学家、出版人在人类已积累的优秀文化基础上开展创新。

以“文学·城市·阅读·AI·未来”为主题，邱华栋、鲍鹏山、陆铭、乔宇等专家学者通过跨学科碰撞交流，从不同维度展望出版未来、分享阅读体会，探讨阅读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文学不会随着科学进步而消亡，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为文学插上新的翅膀。大模型、AI技术的想象力、对情感的理解能力，包括很多知识准确性都

存在局限性。”乔宇谈到，对读者来讲，要坚持阅读思考，“我们对知识的追求、对知识的理解是AI不能代替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多更多接触，通过AI帮助我们更好思考，增强人类更大的创造力。”

“我们要不断推动读书热潮，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有句话，他说书籍这个东西从来是买得多，读得慢，但不要紧，只要把这些书买回家，放在身后书架上，仿佛有一群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身后，这就是书籍的感召和力量。”邱华栋说。

“创新有四个特征：未知性、累计性、偶然性、集聚性。”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说，“创新的发生，需要人与人见面，进行知识的传播、交流、互动。知识的碰撞在什么样的空间产生？十分重要的就是城市的第三空间。上海书展、‘书香上海·东方阅读’盛典就是这样公共的第三空间。”

在上海文史馆馆员鲍鹏山看来，在阅读的过程中，要保护理性，提升理智，从永恒尺度，阅读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永远保持人类的自我的本质，使人可以称之为‘人’。”专家们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始终如一。它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理解世界、塑造自我、传递文明的重要途径。

据悉，作为集团在上海及长三角的桥头堡，东方出版中心坚持立足区位优势，依托属地丰富资源，积极探索阅读推广新路径，助力书香上海建设。